

万隆会议与新中国外交

□ 余建华

65年前的4月18日，万隆会议召开。“和平相处、求同存异”是万隆会议的精神，“共同发展、合作共赢”则是万隆精神新的时代内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鼓舞下，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高涨，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亚非地区已出现30个民族独立国家，但殖民主义在亚非地区的统治远未结束，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因此，加强相互间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独立自主发展民族经济，支援被压迫民族解放斗争，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1955年4月18—24日，亚非29国的300多位代表在印度尼西亚秀丽的山城万隆成功举行第一次亚非会议（即万隆会议），这是国际关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会议。

万隆会议与中国外交的开拓

万隆会议是亚非各国团结合作、求同存异、协商一致的结晶。万隆会议的成功举行，离不开中国政府及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的代表团的关键作用与杰出贡献。

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对世界局势具有重大影响。中国虽然不是万隆会议的发起国，但中国从会议酝酿阶段就积极响应、大力支持。

赴会之前党中央认真制定了具体的与会方案，确定与会总方针为“争取扩大世界和平统一战线，促进民族独立运动，并为建立和加强我国同若干亚非国家的事务和外交关系创造条件”。为力求会议取得成功，党中央强调，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上应积极肯定和表达亚非国家人民的要求和平、独立和发展本国经济文化的共同愿望，而不应使会议陷入关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争论。

以周恩来为主要领导的中国代表团挫败了包括“克什米尔公主号”爆



周恩来出席万隆会议

炸案在内的敌对势力的阴谋，会议期间开展了原则性与务实性相统一的富有成效的灵活外交，发表了重要演说，提出“求同存异”，以共同的历史遭遇、共同的时代使命确立亚非各国团结合作的共同基础，解开和平共处问题上的争议，推动会议在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联合国宪章基础上达成包括万隆十项原则在内的最后协议。中国代表团在会议期间以诚相待，广交朋友，消除了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偏见、疑虑和误解，是新中国外交极其重要而关键的一步，随后掀起与亚非国家广泛建交的高潮。

万隆会议也是中国在亚非地区打开外交局面的历史里程碑。万隆会议之前，除朝鲜、蒙古和越南三个社会主义国家外，与新中国建交的亚洲民族主义国家是印度、印尼、缅甸、巴基斯坦、阿富汗5国。而万隆会议之后到1959年短短的4年间，就有尼泊尔、柬埔寨、埃及、阿尔及利亚等10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1960—1964年，又有加纳、老挝等14个亚非国家与中国建交。中国与亚非国家的国际合作相得益彰，广大亚非民族国家获得独立主权，并通过南南合作显著提升在国际社会中的整体影响，新中国也因此获得多数亚非国家的外交承认，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并在1971

年10月成功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

万隆精神的当代弘扬

半个多世纪以来，国际格局和国际体系发生深刻复杂的变化。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冷战对峙已成历史，各国之间相互联系和依存明显增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潮流。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成为时代赋予中国和亚非国家的共同使命。

虽然目前中国经济总量和国际地位显著提高，但中国与广大亚非国家所共同面临的振兴经济、实现现代化的发展任务，决定了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和亚非各国同属于一个相互依存、利益交融的命运共同体。资本、技术、信息、人员跨国流动的全球化深化，已将世界变成瞬间万里、天涯咫尺的“地球村”；各国相互依存、利益高度交融的状态，在国与国之间构建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共同利益纽带。

当前，中国在坚持对外开放、和平发展、建设和谐世界的基础上，进一步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以同舟共济、合作共赢，寻求多元文明交流互鉴的新局面，寻求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的新内涵，寻求各国合作

应对多样化挑战和实现包容性发展的新道路。

如今的中国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坚定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同时对发展中国家给予积极帮助。这种理念明确地体现在我国“真实亲诚”的对非政策和“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上。中国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开展全方位、多层次的国际合作，成为和平发展的推动者和全球治理的参与者，在互利共赢中，寻找各方利益的共同交汇面，以开放的胸襟和包容的态度推进地区与跨区域合作，在共同发展中获取助益，努力应对共同挑战，同时也让我国发展惠及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更为广泛的国际社会。

建设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国际形势深刻变化、各国利益多元交融的背景下，中国与时俱进的外交新理念，也是对以求同存异、团结合作、和平发展为要旨的万隆精神的继承和弘扬，对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合理化，具有重大的现实价值。

（摘自2019年4月18日《团结报》）

周恩来拨正万隆会议航向

□ 周溢潢

1955年4月18日，万隆会议在印尼开幕。这一会议引起新老殖民主义者特别是美国的不满和反对。他们唆使少数跟随他们的亚非国家从内部进行挑拨，企图使会议分裂、失败。开幕当日，发言者中第一个跳出来为殖民主义辩护、反对共产主义的，是伊拉克代表费马利。他的发言用了很长篇幅来攻击共产主义，他要求人们对共产主义采取“防御措施”。费马利的发言打破了会议开幕式的和谐气氛，使会议蒙上了一层阴影。19日上午的发言中，又有一些国家的代表加入了费马利的行列。人们担心，会议是否会出现西方国家所预言的争吵、分裂。

关键时刻，周恩上台发言。这

篇极为精彩的发言为会议拨正了方向，而周恩来预先准备好的讲稿，则作为书面发言印发给与会代表。这篇补充发言是利用中午休会时间由周恩来口述、他的翻译浦寿昌笔录而成的。

周恩来讲话开头就宣布：“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而不是来吵架的。”此话一出，会场上的气氛顿时起了变化。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共产党人从不讳言我们相信共产主义和认为社会主义制度是好的。但是，在这个会议上用不着来宣传个人的思想意识和各国的政治制度，虽然这种不同在我们中间显然是存在的。”周恩来不卑不亢、合情合理的讲话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住了全场所有人的注意力。

接着周恩来提出了著名“求同存异”命题。他说：“中国代表团是来

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从解除殖民主义痛苦和灾难中找共同基础，我们就很容易互相了解和尊重、互相同情和支持，而不是互相疑虑和恐惧、互相排斥和对立。”

周恩来以洪亮的声音讲了最后一段话：“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这时，全场掌声雷动，许多代表纷纷过来与周恩来握手表示祝贺。

周恩来的发言，驱散了两天来笼罩着万隆会议的阴霾，为会议指出了成功之路，在国际上引起了极大反响。印度总理尼赫鲁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演说。缅甸总理吴努说，这个演

讲是对“抨击中国的人一个很好的答复”。西方通讯社也不得不承认周恩来的极大成功。法新社说，“周恩来是会议中最受欢迎的人物，他的语调、温和的演说，以及他提供的保证使得与他交谈的人为之倾倒，消除了疑虑”。

会议在周恩来拨正了航向后，经过讨论和协商，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和合作的宣言》。4月24日，万隆会议闭幕，历史上第一次以亚非29个国家的名义发出的文件——《亚非会议最后公报》被一致通过。

（摘自2015年4月24日《解放日报》）



董必武：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中共代表

□ 石源华

在1943年5月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中国共产党加速了走向世界的新历程。董必武便是这一事业的开创者和先驱。

抗日战争期间，董必武作为中共的七个国民参政员之一，常驻重庆，参与领导了整个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中国共产党对于美、英的外交争取工作始于反对国民党顽固派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斗争。当国民党部署重兵、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时，董必武独力承担起领导南方局全面工作的重任，在开展对于各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工作的同时，向各国

驻重庆记者和使馆官员说明真相，宣传制止内战、共同抗日，迫使蒋介石改变反共计划。毛泽东高度评价董必武在重庆的工作“很得力”。

抗日战争后期，董必武加强了同英、美等国记者，英、美使馆和美军代表团的接触，积极促成了1944年中外记者团和美军观察团访问延安，向世界介绍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带领敌后抗日根据地军民抗战的情况，打破了国民党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

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一次重要展示是，董必武以中国共产党代表的身份，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1945年4月25日，联合国大会在美国旧金山举行。中共中

央决定派遣董必武率随员章汉夫、陈家康赴美参会。5月1日，中国代表团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到会记者600余人，最引人注目的是中共代表董必武。他不卑不亢、笑容可掬，一派政治家又似学者的风度，博得全场热烈的掌声。不少人都通过董必武认识了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形象。董必武参加了旧金山会议第三委员会的工作，与他国代表经过数百小时的仔细推敲，为完成《联合国宪章》这一历史性的文件作出了贡献。6月26日，董必武出席了《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董必武与中国代表团全体成员一起，被安排最早在该宪章上签字。随后，又参加了在旧金山歌剧院举行的

闭幕式，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治大舞台上的重要亮相。

会后，董必武来到纽约，在美国继续停留4个多月，开辟了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又一个重要战场。他广泛接触各方友好人士和海外侨胞，积极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主张。他还冲破国民党的新闻封锁，在美国筹划出版发行了用英文印刷的《中国解放区实录》5000册，介绍解放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抗击日本侵略者取得的光辉战绩和伟大成就。这些工作对于推动美国人民、海外侨胞和世界人民了解中国共产党起了重要的作用。

（摘自2012年第3期《世界知识》，原标题为《董必武：中国共产党走向世界的前驱》）



在我们的印象中陈毅是一位诗人、军事家。战场上的陈毅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生活中的陈毅登台赋诗、妙然天成。而本文所要展示的是他热爱体育运动的一面。陈毅从小爱好体育，成年以后他对于体育运动仍是情有独钟而且广泛涉猎，从足球、乒乓球到围棋都得心应手。在共和国外交的舞台上，他更是以体育为纽带，把和平、友好之花撒遍所到之处。

坦诚相见，球场兄弟情

中缅两国是友好邻邦，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两国人民就以“胞波”（兄弟）相称。新中国成立后不久，1950年6月8日，缅甸就同我国建交。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缅共同倡导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外交战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1955年万隆会议后，周恩来第一次率团访问缅甸，1957年陈毅陪同周恩来再次访问缅甸时，还以一首《赠缅甸友人》表达两国肝胆相照的兄弟之情。

在20世纪60年代，为了冲破大国沙文主义在外交战线上对我国的封锁，扩大与第三世界国家的交往，1963年4月21日至26日，陈毅随同刘少奇又一次来到兄弟之邦。对于此行，缅甸给予最高规格的礼遇。21日晚，缅甸总理奈温举行盛大国宴，缅甸政军高级官员和社会知名人士几乎全都到场。23日，刘少奇及陈毅一行由奈温陪同到达缅甸西海岸的额不里，宾主将在这里会谈和休息。在额不里海滩，陈毅用一场即兴的足球赛将友好的气氛推向最高潮。

23日下午，在奈温的提议下，宾主组成两支特殊混合的足球队，在海滩上展开“角逐”。青年求学时代的陈毅曾是球队里的主力中锋，是绿茵场上威震蓉城的“五虎将”！虽然此时年已62岁的陈毅动作不似年轻时的矫健，但脚下的功夫仍旧不见减弱，还是那么熟练。他接连踢出好几个漂亮球，显出好身手，引得坐在一旁观战的刘少奇夫妇和爱人张茜频频鼓掌喝彩，而精彩有趣的比赛也让场下的观众欢笑不止。这时对方的球员已经逼抢过来了！只见陈毅不慌不忙，在对方离自己还有一两步距离时，他以左脚为支撑，以一记标准的右脚内侧推球，将球传给了准备接球的队友——奈温总理。“咔嚓”一声，相机将这一刻记为永恒，成为外交史上的一段佳话。

围棋探路，妙手化僵局

新中国成立后，中日两国政府间交往中断，只保持了一部分民间交流。为了打破僵局，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于1959年9月率团访华以示友好，并与周恩来举行会谈。10月，以日本自由民主党顾问松村谦三为首的自民党众议员代表团来访。松村是日本自由民主党元老，曾多次担任日本内阁大臣，与廖承志是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校友。他主张改善中日关系，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

松村怀着忐忑的心情抵达北京。在此之前，他除了和校友廖承志有一定交往之外，与我国其他领导人还是第一次见面。然而松村在京停留期间，却时任外交部部长的陈毅一见如故，结为棋友。原来松村自幼酷爱围棋，而陈毅也是围棋高手。松村在京期间，与周恩来和陈毅举行多次会谈。会谈之余，数次与陈毅对弈。当时陈毅以一个朋友的身份向松村建议，“围棋、乒乓球、书法、兰花都可以交流，不谈政治，只谈友好”，松村欣然同意。在访问即将结束之际，松村谦三请求在中日两国贸易达到一定规模、需要进一步发展时，中国派一个围

陈毅和他的体育外交

□ 赖鹏辉

棋代表团访日，以围棋为突破口推动中日两国友好交往。陈毅欣然同意。这就是后来传为美谈的“围棋外交”。

在松村的推动下，1960年第一个日本围棋代表团访问了中国。日本著名棋手与中国围棋界人士广泛接触，多次对弈，共同切磋棋艺，结交了不少朋友。1962年，中央决定派国家体委副主任、中国围棋协会主席李梦华为团长，带领中国围棋代表团访问日本。出发前夕，周恩来和陈毅在百忙之中抽时间召见代表团一行。陈毅对随行的中日友好协会会长廖承志特别叮嘱：“随团家属，要搞两套活动，即围棋团的活动和你个人的活动。不过，后者要顺其自然，见机行事，不要操之过急。”在周恩来和陈毅的指示下，中国围棋代表团首次访日获得了空前成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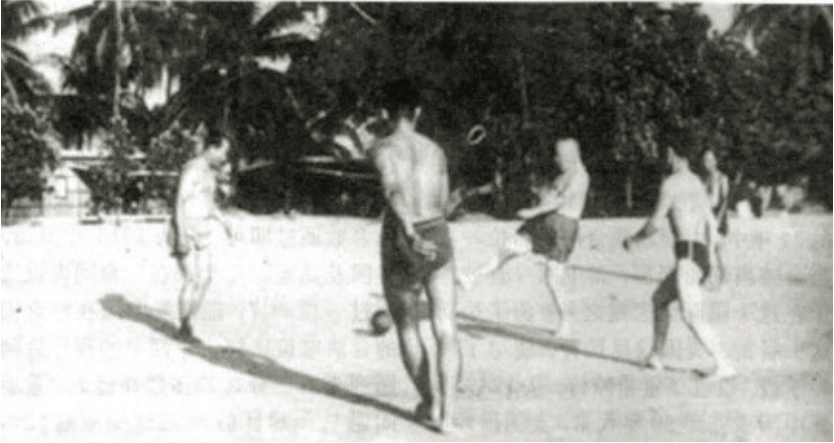
1963年9月、10月间，应中国围棋协会的邀请，日本棋院和关西棋院联合派团访华，在围棋界的交往史上可以说起到了“里程碑”的意义和作用。日本棋院为了表彰陈毅为推广围棋文化，促进中日围棋界交流所作出的贡献，特授予陈毅围棋“名誉七段”称号。在表彰仪式上，当杉内雅男团长把烫金荣誉证书交给陈毅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为了促进我国围棋事业的发展，为了推动中日民间友好往来，陈毅还出任了中国围棋协会的名誉会长。此后，陈毅总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指导陈祖德等棋手下棋。再后来聂卫平等年轻棋手成长起来，并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中横扫日方，为国人争了光，这和陈毅经常与这些棋手对弈，为他们出主意想办法，商讨如何提高和普及中国围棋分不开。

1964年，日本29位著名围棋手发表呼吁书，号召日本800万围棋爱好者参加要求恢复中日邦交征集3000万人签名的活动。由于中日各界人士长期不懈地努力推动，1972年9月29日，中日两国正式建交。在这一光辉历史篇章中，“围棋外交”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在中日民间友好交往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

从1958年陈毅被任命为外交部部长，直到1972年他在北京去世，在他的14年的外交生涯中，周恩来对他的外交才干和风格曾作出如下评价：他在对外活动中有鲜明的特色和独到之处；他思路开阔，知识深广，眼力敏锐，胆略超人，言谈中往往有新创造、新境界。正是由于陈毅在外交上思路开阔，胆略过人，因而在对外交往过程中手段灵活、方式多样，更是开创性地以体育为纽带促进了外交的发展，促进了世界的和平发展。

（摘自2008年第10期《党史博采（上）》）



陈毅在额不里海滩同奈温一起踢足球，左三陈毅、左一奈温。